

启良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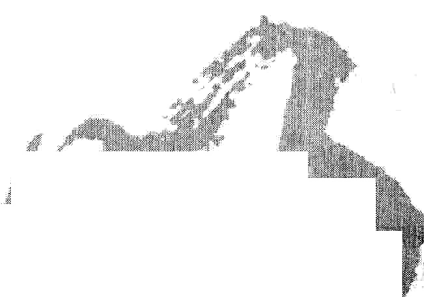
中国文明史^上

中国历史的最大特色是大一统政治、小农经济和文化专制主义的三位一体，而且是一种经典模式，非常适合古代社会。它的形成和变化，同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阶段性发展。



启良 | 著

中国文明史^上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明史(上、下册) / 启良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 12

ISBN 978 - 7 - 5125 - 0055 - 6

I. ①中… II. ①启… III. ①文化史—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461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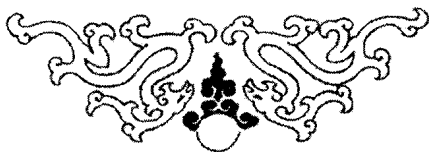
中国文明史(上、下册)

作者 启良
责任编辑 于艳宁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45 印张 95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25 - 0055 - 6
定 价 68.00 元(上、下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 sina. net
[http://www. sinoread. com](http://www.sinoread.com)

《中国文明史》再版附识

启良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所涉及，发表的成果亦不少，既有考据性的“小学”，亦有理论性的“大学”。早在大学期间，一方面在课堂上听老师们照本宣科式的讲授，尽可能一字不漏地记笔记，但另一方面总觉得心里盪盪的，尤其对于当时的教科书和历史研究中的所谓“五朵金花”很是不满，亦曾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国人从教条化的理论泥淖中拉扯出来。记得大三的时候，听徐泰来老师讲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徐老师算得上思想解放的人，可我总觉得他的课言犹未尽。一个周末，我以通信的形式给他写了一篇近万言的文字，主要是谈自己对洋务运动的看法。只是这封信没有寄给他。因为自己的看法写下了，自然也就没有了邮寄的冲动。类似的文字，或长或短，在那几年写过许多，只是无片语保存下来。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讲世界古代史。这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课，所谓的“五朵金花”，该课程大部分都要涉及到。我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尤其对于明知道是错误的东西，打死我，我也不会跟着说的。但是这对于我这位新留校的助教来说，实在是一件犯难的事情。一方面，我不想明知故犯，以讹传讹；另一方面，自己又没有能力在教科书体系之外另走新路。幸好三年后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求学。在这里遇上了惠我终生的两位先生，一位是刘师家和，另一位是马师香雪。

刘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自谦为杂家。可学界许多人都知道，先生于世界古代史、中国先秦史、佛教和西方哲学四个领域，都可培养博士研究生。我虽名义上不在先生门下，但先生待我，视若己出。那几年，先生的名头还不多，会议少，应酬也少，生活极有规律，而且作息时间是特别，一天睡四五次，每次个把小时。这样的生活和工作习惯，学生是不宜多打扰的，求教也必须在限定的时间之内。可先生对我，



似乎特别。每次请益，他都是打破作息常规，谈历史，谈哲学，有时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后来由历史转为哲学，并致力于用哲学的思维看待整个人类历史，实乃得惠于刘先生的教诲与影响。只是佛教的门径，未得先生指点，至今尚在户外。

马香雪先生是天主教徒，年轻的时候还曾做过北平天主教会的领导。此种信仰和经历，可想而知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期会是怎样一种人生境遇。我就读北师大时，先生是历史系资料室的资料员。由于缺乏相关的教员，系里请他给我上拉丁文课。一周一次，每次一上午，在他家里上，颇像旧时的私塾，一名老师一名学生，一字一句领着我念。上课前，先生总是先沏好一壶茶。先生收入微薄，想必茶叶不是很好，但他沏出来的茶，却是满口香润。我后来一直不喝茶，只喝白开水，就是因为哪怕是再好的茶，总觉得没有当年先生的茶好喝。先生虽不以学术为业，但却有很好的学养。人也雅，文也雅，其所校对的（确切说，许多地方实为重译）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足可见其中学西学皆为上品。而且马先生虽从来没有写过理论文章，但其理论修养甚佳。每当谈到人类历史，特别是谈到 20 世纪的中国，先生总能给我某些启示。关于这一点，我还是十余年后因广读现代西方神学家的著作，才算明白过来。宗教所关心的是终极问题，或许正惟这样，神学家们看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才会比世俗哲学家更为深刻。

正是有这两位学术前辈的捧托，再加上自己内心的理论冲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那几年，我陆续写出了数十篇论文和《史学与神学》、《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两部著作。目的亦很明确，一是较为系统地向国内学界介绍现代西方历史哲学，二是对所谓的“五朵金花”展开全线的反思与批判。如果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前者为“批判的武器”，后者为“武器的批判”。这些著作和论文，自以为在当时国内的史学理论界尚属前沿。

然而理论反思是一回事，实际用于大学乃至中学的历史教科书则又是另一回事。原因在于，这些年，真正的读书人愈来愈少，学科分际又愈来愈细，史学理论的反思仅限于关心理论的人，那些不关心理论的人还是照旧照本宣科，以讹传讹，很难跳出传统教科书的圈子。比如所谓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就已明确指出，在中国是没有这样两种社会形态的。如果勉强言之，也只能把西周至秦灭六国这一段历史叫做“封建社会”。至于奴隶社会，在中国完全是一种牵强甚至荒唐的说法。可是我们现在大学乃至中学的教科书，基本上还是按照所谓的“五种生产方式”来编写的。正是基于国内此种史学现状，大约在写完《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一书之后，我便有自己写一部中国历史的想法。

更需指出的是，这部《中国文明史》的写作，除上述动机外，另有一个目的便是：我是一个现实感很强的人，虽然学术研究与写作在古代或纯理论方面，但吾国吾民 20 世纪的坎坷一直是自己难以释怀的。中国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为何到了 20 世纪竟是如此的荒唐和不幸？历史由思想引导，而引导历史的思想又是历史性的。也就是说，欲说明 20 世纪那么匪夷所思的人和事，同样需要对古代中国有一透彻认识。加上上世

纪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盛行，尤其是现代新儒家很有市场。而在我看来，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关键在于能否走出中世纪；倘若以复兴儒学为救治之方，无异于抱薪救火，火上加油。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知识分子便展开了文化讨论，并试图通过中西文化比较而为本民族寻到一条自我更新的道路。而且此种讨论至今还在进行。至今仍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文化之路。何以故？缘由便在于我们的学者对中西两种文化精神的理解大有问题。诚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研究成果毫无意义，但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即我们的学者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理解尚欠深度，尤其对于自家几千年的历史理解不透。

从大学时代起，我走的也是一条杂家之路。就时间言，由远古而现代；就空间言，由西方而中国；就学径言，由历史而哲学，再由哲学而历史。在我自己看来，这样的治学路子或许最有益于写大宏观的历史，至少对一些关键性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看得更为清楚。

《中国文明史》首版于2001年春。见于书肆，颇受欢迎。这是我自己也没预料到的。此书从形式上看，颇有点不伦不类：并非通俗，但可作通俗读物阅读；以年代叙，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史，而且我也写不来教科书之类的作品；记人记事，往往是叙少而议多，许多地方甚至是论文或散文；写历史，常规是厚今薄古，而此书的绝大篇幅在汉代以前，因为在我看来，中国文明模式到汉武帝时代已经基本成型，往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只是周期动荡，周期循环。

此书首版距今十年，书市早已告罄，今得以再版，自是幸事一件。更可喜的是，英文版亦即将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术荒凉的今天，本书尚有如此境遇，吾之幸甚。

我为什么这样写中国历史(代序)

远古卷

(从传说时代到商代)



第一章·远古历史的理解问题 / 15

- 一 从顾颉刚的“层累说”说起 / 15
- 二 再从《山海经》说起 / 17
- 三 精神的考古 / 20
- 四 神话中的史话 / 23

第二章·文明起源的几个理论问题 / 26

- 一 文明与文化的区别 / 26
- 二 文明的起源何以可能 / 28
- 三 文明起源的一元与多元 / 32

第三章·从传说看远古的历史 / 35

- 一 中国神话传说诸特点 / 35
- 二 作为中华民族之共祖的黄帝 / 38



- 三 从三皇到五帝 / 41
- 四 禅让说与原始民主制 / 44
- 五 大禹与洪水之谜的破揭 / 48

第四章·夏代文明 / 53

- 一 “夏”的由来 / 53
- 二 华夏集团与夏文明的起源 / 55
- 三 家天下的确立 / 58
- 四 家国合一与中国政治模式 / 61
- 五 九鼎与九州 / 63
- 六 夏代家天下的维系 / 66

第五章·商代文明 / 71

- 一 商同夏的关系 / 71
- 二 汤与伊尹 / 73
- 三 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 / 76
- 四 商代的国家形态 / 79
- 五 商代的方国 / 81
- 六 人祭与人殉 / 82
- 七 甲骨文字及其他 / 86

第六章·中国先民的英雄时代 / 91

- 一 英雄时代的世界历史共性 / 91
- 二 夸父的启示 / 95
- 三 青铜器的启示 / 98
- 四 嗜酒的商代人 / 101
- 五 乐舞与先民的精神气质 / 103
- 六 史诗问题 / 106

第七章·远古时代的神灵崇拜 / 109

- 一 先民神灵崇拜的一般规律 / 109
- 二 两种生产与两种崇拜体系 / 113
- 三 中国先民的生殖崇拜 / 114
- 四 龙崇拜 / 123
- 五 祖庙与祖先崇拜 / 126
- 六 上帝崇拜 / 129
- 七 政治化的巫术 / 131

上古卷

(从西周到汉武帝时代)



第一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 139

- 一 周族的起源 / 139
- 二 武王伐纣 / 142
- 三 “汤武革命”小议 / 144
- 四 封邦建国 / 148
- 五 宗法制度 / 150
- 六 国野制度 / 153
- 七 畿服制度 / 155
- 八 井田制度 / 157
- 九 城邦问题 / 160
- 十 生生之谓易 / 164
- 十一 天的崇拜 / 170

第二章·周公与中国文明的转向 / 174

- 一 殷周文明之异同 / 174
- 二 周公之僭位 / 177
- 三 周公的“伦理宗教” / 185
- 四 周公制礼作乐 / 190
- 五 中国文明模式的初步形成 / 194

第三章·中国的“轴心时代” / 201

- 一 世界历史意义上的“轴心时代” / 201
- 二 由官学到私学 / 204
- 三 士的兴起 / 211
- 四 道：中国知识分子的十字架 / 215
- 五 夷夏之辨与文野之辨 / 227
- 六 民本同民主之间 / 231

第四章·春秋：礼乐的崩坏 / 238

- 一 西周的衰落 / 238
- 二 春秋时期社会变革之性质 / 239
- 三 礼乐之崩坏 / 244



- 四 诗亡然后春秋作 / 246
- 五 霸业与霸道 / 251
- 六 社会等级制度的瓦解 / 257

第五章·战国:礼乐崩坏之后 / 262

- 一 战国七雄 / 262
- 二 各国的变法 / 265
- 三 新的经济形态 / 267
- 四 插叙: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 / 270
- 五 商业的繁荣 / 278
- 六 楚文化 / 283
- 七 屈原臆说 / 289

第六章·六家要论 / 293

- 一 六家之异同 / 293
- 二 墨家要论 / 298
- 三 名家要论 / 301
- 四 阴阳家要论 / 304
- 五 道家要论 / 311
- 六 法家要论 / 318
- 七 儒家要论 / 322
- 八 平心论孔子 / 327

第七章·秦帝国之短命 / 332

- 一 秦的统一 / 332
- 二 吕不韦和他的《吕氏春秋》 / 336
- 三 秦代的建制 / 338
- 四 焚书坑儒 / 342
- 五 秦王朝短命之原因 / 344
- 六 德与力的最后较量:楚汉之争 / 347

第八章·汉代的兴盛与大一统文明模式的形成 / 355

- 一 汉承秦制 / 355
- 二 从分封到削藩 / 357
- 三 黄老之学与文景之治 / 362
- 四 董仲舒的儒学宗教化 / 366
- 五 公羊学与知识分子的道势两难 / 371
- 六 大一统的教育制度 / 374

- 七 尚贤原则下的文官制度 / 377
- 八 礼法合一 / 384
- 九 重农而抑商 / 388
- 十 外柔而内厉 / 395

中古卷



(从汉武帝时代到盛唐时期)

第一章·汉王朝由盛而衰 / 405

- 一 盛极而衰 / 405
- 二 王莽改制 / 411
- 三 外戚与宦官的专权 / 416
- 四 党锢之祸 / 422
- 五 今古文经学之争 / 427
- 六 讖纬之学 / 433
- 七 佛教的传入 / 439
- 八 道教的产生 / 443

第二章·四百年的动荡与分裂 / 447

- 一 中国式的统一与分裂 / 447
- 二 三国鼎立 / 450
- 三 司马氏的统一 / 454
- 四 西晋:表面的统一 / 455
- 五 五胡乱华 / 458
- 六 北魏的统一与再次分裂 / 463
- 七 东晋的门阀政治与南北战争 / 468
- 八 南朝:宋齐梁陈的更替 / 470

第三章·乱世之中的文明形相 / 472

- 一 中国文明主流的歧出 / 472
- 二 门阀制度 / 474
- 三 经学式微与玄学风盛 / 479
- 四 所谓“魏晋风度” / 484
- 五 道教的变革 / 493
- 六 佛教的艰难发展 / 498
- 七 儒学命脉的维持 / 5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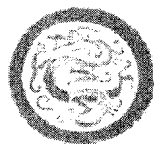
- 八 文学艺术之自觉如何可能 / 509
- 九 魏晋时代所形成的中国式的审美 / 512

第四章·新的繁荣 / 518

- 一 隋朝:又一个短命的王朝 / 518
- 二 贞观之治 / 522
- 三 武则天:中国唯一的女皇帝 / 527
- 四 开元政治 / 529
- 五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初步形成 / 531
- 六 盛唐气象 / 535

近古卷

(从安史之乱到鸦片战争)



第一章·唐王朝由盛而衰 / 551

- 一 由杨贵妃想到历史的偶然与必然 / 551
- 二 安史之乱 / 554
- 三 藩镇割据 / 556
- 四 宦官与朋党 / 558
- 五 黄巢起义与唐的灭亡 / 561
- 六 五代十国 / 564

第二章·柔弱的宋王朝 / 567

- 一 文明与野蛮的变奏 / 567
- 二 皇权的更为集中 / 569
- 三 宋初同辽、夏之关系 / 573
- 四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 / 574
- 五 金兵的入侵与北宋的灭亡 / 577
- 六 南宋王朝的苟且偷生 / 580
- 七 两宋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 582

第三章·蒙古人的百年统治 / 586

- 一 蒙古族的兴起与扩张 / 586
- 二 元朝的汉化统治与民族压迫 / 589
- 三 《马可·波罗游记》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 593
- 四 元朝的残暴统治及其灭亡 / 597

第四章·腐朽而极端专制的明王朝 / 601

- 一 朱元璋的发迹与建国 / 601
- 二 朱元璋的极权政治 / 604
- 三 骇人听闻的文字狱 / 606
- 四 朱元璋的几分好处 / 609
- 五 宦官的猖獗 / 612
- 六 张居正改革 / 615
- 七 东林党人 / 617
- 八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 / 620
- 九 由李闯王再议中国文明的深层结构 / 626

第五章·清王朝:最后一个旧式的专制王朝 / 631

- 一 满人的崛起 / 631
- 二 清政府的民族压迫 / 632
- 三 皇权的更为强化 / 635
- 四 清代的文字狱 / 638
- 五 考据学及图书的整理与编纂 / 642
- 六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正式形成 / 646

第六章·禅宗:中国化的佛教 / 649

- 一 隋唐时代的佛教宗派 / 649
- 二 禅宗与中国的宗教改革 / 653
- 三 禅宗的发展 / 656
- 四 佛教的中国化 / 659

第七章·宋明理学 / 663

- 一 唐代的儒学复兴运动 / 663
- 二 理学的建立与早期发展 / 666
- 三 朱熹与陆九渊 / 673
- 四 王阳明与“王学末流” / 679

第八章·晚明思潮 / 686

- 一 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景观 / 686
- 二 新的理欲观 / 689
- 三 新的义利观 / 693
- 四 新的政治观 / 696
- 五 晚明思潮与中国式的启蒙 / 701

我为什么这样写中国历史（代序）



凡是读过本书的读者，不难发现拙著颇为特殊。这就是：

一、写中国古代的历史，不再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分期，而是将五千年文明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段，而且这四个时段之间的分界亦背于常理。

二、对一部中国历史的理解，理论之源既不在以往学界所奉行的“经济决定论”，也不是韦伯的“意识决定论”，而是二者兼而有之。但对二者又是有所侧重的，即看重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三、厚古而薄今，而非像以往史家通常所做的那样——厚今而薄古。

四、以往的历史教科书，大量的篇幅花在经济关系及农民战争方面。本书对此虽有涉及，但却不是充分的，而且立场和讲法亦大为不同。

五、不是以中国论中国，而是将一部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因而常常说到别的民族的历史上去。

六、写通史性的著作，本应少议（或不议）而多叙。本书则是夹叙夹议，甚或议多而叙少，很不像人们观念中的中国通史。

我这样写中国历史，实在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至少主观上是如此），而是觉得如此写法，既能充分表达自己对一部中国历史的理解，亦可助于读者诸君从较为深入的层次认识中国文明的特性。为方便阅读，或曰为了不使各位读者对此种写法有某种排拒心理，兹就本书的“特殊”之处，谈谈自己的具体想法。



中国人写历史多以朝代分段，二十五史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写下来的。本世纪20年代以后，虽然以朝代断限的传统仍在，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历史著作从根本上有了一种新的写法，即将从夏代（或商代）到鸦片战争的历史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阶段。

从思想来源看，此种历史分期法出自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特别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著名的话，基本上铸成了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形态理论框架。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更是明确指出：“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也好，斯大林也好，如果将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仅仅视为一家之言，倒也没有什么不好。何况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确有许多精彩的地方。然而在本世纪特殊的“东方时空”里，所谓“经典作家的语录”被看作比《圣经》还要神圣的词句。于是，“五种生产方式”说被钦定为正统的史学理论，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要按照这一钦定的理论模式而拼贴而附会显得有失偏颇。

很长时间里，中国是苏联“老大哥”的忠实追随者，一部中国现代史也基本上是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蓝图改写的，因而对于“五种生产方式”说，也就只能信从，不能有丝毫地怀疑。80年代以来，学术界稍有松动，学者们终于敢越此雷池，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虽然许多人仍在原有的意识形态里说话，但毕竟有了不同的声音。但是，争论只在史学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新的看法很少落实于历史著作的撰写。尤为不可的是，从中学到大学，历史教科书还是原来的老框框老调调，讲中国历史，还是讲奴隶社会，讲封建社会。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否真的就是“五种生产方式”说，斯大林的钦定模式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我在近年的文字中多有论述，姑可不赘，这里只是想说明中国历史之实际同“五种生产方式”说很不相符，古代中国是没有什么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

什么样的社会可以称作奴隶社会，按照我的理解，其标准应该是：（一）奴隶制经济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二）奴隶制在其存在的时代是为合理的生产方式或剥削方式；（三）奴隶同奴隶主的矛盾是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如果这三个标准可以成立，那么我们说，中国古代是没有奴隶社会的。从郭沫若开始，到后来许多历史学家，为了成全他们所认可的理论，不惜曲解历史，把根本不是奴隶的庶民，都作为奴隶看待，甚至达到极为可笑的地步。

如果按照中文的字面理解，中国确曾有过“封建”的历史现象，这就是“封邦建国”的制度，简称为分封制。该制度首创于周代初年，而真正实施过也只在西周几百

年。孔夫子感叹“礼崩乐坏”，实则就是不忍看到封建制分崩离析。分封制虽然在汉初、西晋和明初等几个时期复活过，但其规模和性质已大不同于西周。因为在这几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郡县制，而不是分封制。可奇怪的是，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把实行封建制的周代说成是奴隶社会，而把周以后的各朝各代说成是封建社会，甚至把孔夫子骂为开历史倒车的人，说他维护奴隶制而反对封建制，却不知孔夫子所力图维护的正是封建制。只不过，此种封建制与相对于奴隶社会而言的封建制大为不同。

中国的现代史家所谓的“封建制”，术语和思路均来源于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分析。但是，西周以后的中国同中世纪的西欧完全是两回事，最明显的区别是：在马克思的眼里，西欧的封建制社会，公有和私有并存，而在中国却没有这样的经济结构，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私产，西欧意义上的私有制和公有制都是没有的。可是多少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家枉作章句之学，枉打笔墨官司。本来就没有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史学家们却竭尽心力去寻找二者之间的界限。而这也就是我曾说的“缘木求鱼”式的历史研究。本世纪中国学术可悲的是，正是这一“缘木求鱼”式的历史研究，造就了多少“大师”级的历史学家。或者说，许多人正是因着这一所谓的“历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而成为“大师”的。

历史分期之所以可能，一是因为历史之本身具有阶段性，二是出于人们对历史的主观认识。或可说，历史分期乃是在人们认识历史的活动中主客体互渗的产物。由此决定着，任何历史分期都是有局限的，都有商榷的余地。而且从学理上说，研究者因其视角的不同，可以作出不同的分期。我之所以批评近几十年来的所谓历史分期为“缘木求鱼”，不是认为那些“大师”们不可以讨论历史分期问题，而是认为他们根本忽视了中国历史之实际，其研究工作不是对历史负责，而是对给定的理论模式负责。

那么，我自己将一部中国历史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个时段，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特别是，各个时段的分界线之确定，又有何根据呢？

先要申明的是，按照我的理解，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以商周之际为界，划分为两大阶段最为合适。原因是，此时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是全方位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周以前，先民为部落社会，处于英雄时代，尚力不尚德，精神世界神人相通，信奉的是自然宗教。而西周初年，由于周公旦的制礼作乐，英雄时代始告结束，政治伦理化神秘化，自然宗教转变为伦理宗教。可以说，尔后三千年的文明模式，基本上是在周初定型的。

但是，周初以后的三千年历史，如果仅仅看做一个阶段，不免显得过于笼统，非但不能反映其间的曲折与变化，也不便于我们今日的研究实践。因之我又将之分为三个阶段，即上古、中古和近古，且分别以汉武帝时代和唐玄宗时代划界。我的大体思路是：周公旦所建立的礼乐文化虽然规范了尔后中国文明的发展路向，但毕竟只是一雏型，很不完善。从春秋到秦再到汉初，便是这一文明模式不断完善的过程，汉武帝时代终于发展到经典形态，即专制主义政治、小农经济和儒家纲常伦理三位一体。但



是这一具有经典意味的文明模式毕竟是一新生事物。特别是，汉代是第一个平民社会的王朝，而平民社会同这三位一体文明模式的结合，更是短时间内才有的。也就是说，这一文明模式同样需要经过历史的考验。而从西汉后期到唐初，七个世纪左右的历史，无论是山河破裂，三教并竞，还是贵族社会再次抬头，都可看作是对大一统文明模式的考验。政治上由分裂走上统一，由九品中正制走上科举制；经济上由占田制转为均田制；思想文化上儒学再次被奉为国教，这一切无不表明由汉武帝所正式创立的经典模式，经过几百年的风雨历程，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特别是科举制的推行，更使此种经典模式有了制度化的保障。盛唐时期的恢宏气象，就是这一文明模式经受考验之后所结下的果实。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顶峰期，但同时又意味着盛极而衰不可避免。原因是，唐代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成就均已表明，汉武帝时代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到此时已经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这是一种自足封闭的文明体系，虽不能实行实际意义上的自我更新，但却能长期地延续下来，用前些年学术界流行的话说，具有一种“超稳定结构”。但由于在此种文明模式里，诸多矛盾又是它自身无法克服的，故而唐以后，专制主义政治更为残酷和更为腐败，社会矛盾亦更为尖锐，而文明本身也就显得越来越缺乏生气和活力。

我这样看待一部中国文明史，绝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历史的倒退论者。相反，我将汉武帝时代和唐玄宗时代分别作为上古和中古的下限（或曰作为中古和近古的上限），乃是寄托着自己对未来中国的乐观主义之期望。汉武帝时代的辉煌建立在先秦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盛唐时期的辉煌建立在南北朝民族融合的基础上。民族融合不只是战争和流血，也不只是版图的扩大，更主要的是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民族文化的刷新。而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我们的处境或许同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背景相仿佛，虽然不曾有外族的人主，分裂也只是极其短暂的，但中华民族之本土文化同外域文化之关系同南北朝时期或许没有实质性的差别。诚然，今日中国所面对的外域文化是强势的，主领世界文明大潮，远不是当年的西域文明所能比拟。但我相信，只要吾人能够理性对待，不远的将来，定有中华民族再次辉煌的时候。按照汤因比的说法，文明的进程同时也是挑战与应战的关系史。盛唐文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对于外族文化的挑战而应战得法。而今日，我们同样面临着异域文化的挑战，只要吾人应战得法，我想同样可以开创出中华民族的新天新地。

二

历史是怎样发展的，其中有着什么样的规律？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询问和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马克思以前，思想家们多以唯心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问题，认为人类历史只是精神发展的产物。此种历史观最具代表性的，一是基督教的上帝史观，二是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在基督教看来，历史的主宰是神圣的上帝；在黑格尔看